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

十年探索

A DECADE OF EXPLORATION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SOCIALISM(1956-1966)

关志钢 等著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

A DECADE OF EXPLORATION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SOCIALISM(1956-1966)

关志钢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关志钢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
(深圳大学文山湖社科文库)

ISBN 7-5004-4006-5

I . 社… II . 关… III .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1957～1966 IV . 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440 号

责任编辑 朱 华

责任校对 海 岩

装帧设计 水 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有关毛泽东本人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成为学术界的重点研究课题。因为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打上如此鲜明的个人烙印。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深刻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抱负、个性赋予了中国社会，以至他所工作和生活的那段岁月被世人称为“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对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一生几乎就是党的历史的一个缩影。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革命成就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遭受的挫折，也都与毛泽东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

1976 年，毛泽东与世长辞，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相反，在他离世十几年后，具体讲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前后，中国大地上再度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且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毛泽东热”现象。

在这场以“寻找毛泽东”为主要口号的“毛泽东热”当中，有着不同生活、工作和社会政治背景的人，寻找毛泽东的动机不尽



相同，寻找的目标也不一样。其中有的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神秘的一生怀有好奇心理，比较关心毛泽东的一些生活轶事和趣闻；有的则是出于对毛泽东人格的尊重和敬仰，自始至终把他当作人民领袖来怀念；有的是想从毛泽东身上寻找成功者的秘诀和治国安邦的谋略；有的是把毛泽东当作一个政治强人来崇拜。至于理论学术界，主要是出自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以及对近现代中国社会重新认识的需要。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是想从晚年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理论中寻找对付现政权的思想工具。

但无论“毛泽东热”的成因是什么，动机和目标上有什么差别，它至少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道理，即能否正确对待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决定了能否正确对待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而且事关能否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0年至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曾多次谈到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他深刻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他要求将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作为历史决议的中心内容来写，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35年遵义会议被确立为党的领袖，到1976年因病逝世，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40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事业，做出了

不朽的贡献。

实践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正确地领导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人。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于毛，成于邓”，不无道理。

思想上，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独创性理论体系，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政策与策略理论等方面，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既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

诚然，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草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发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这些不足以抵消他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功绩，不能构成否定甚至诋毁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意义的根据。关于这一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有明确结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针对“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阐明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应有态度，其有关内容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这里之所以引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论述，主要是想请读者对我们写作此书的出发点——客观、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至于选择1957年至1966年曲折发展的十年作为我们这本书的话题，也是经过了认真考虑和周密资料准备的。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历史发展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脉络看，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就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此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和摸索，最终才形成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从1956年底、1957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十年，无论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而言，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期间，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成功与挫折、前进与倒退相互交织，情况错综复杂，值得深入研究。

随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中国进入全面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从这时起，毛泽东对自己以往的思想及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认真、系统的思考，但结果却是十分矛盾的。

一方面，在吸取苏联斯大林模式经验教训、正确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口号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样的力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的正确思想的代表，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另一方面，由于经验和实践的缺乏，对迅速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够，加之中苏关系破裂和国际反共气候形成等因素的影响，使领导者对形势的分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认识出现严重误差。晚年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标志的主要思想主张，包括人们所熟悉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为纲”、“党内资产阶级”论等，实际上都是在这十年逐步形成和系统化的。

显然，要把握晚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弄清他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实践误区的根本原因，真正记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深刻教训，同时真正领悟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提法的蕴意，首先就需要搞清楚“文革”前十年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探索的有关史实。

不仅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学术界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极其活跃，成果丰硕，但总体上看，“两头大、中间小”的研究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阶段，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专题性研究仍然比较薄弱。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我们选定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作为研究课题。

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言论、著述的简单汇总，而是经实践检验证明了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在本书的论述当中，除以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为主脉外，将尽可能多地介绍和分析其他国家领导者的有关思想，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年探索的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不足在所难免，非常希望看到广大读者中肯的批评意见，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和提高。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早期认识.....	(1)
一 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思考.....	(1)
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观.....	(5)
三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初步摸索.....	(17)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任务的提出.....	(27)
一 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	(27)
二 “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	(43)
三 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与历史局限.....	(57)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	(69)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69)
二 执政党的建设.....	(85)
三 反右派运动与理论上的走向失误.....	(101)

第四章 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与实践 (113)

- 一 赶超战略的形成 (113)
- 二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29)
- 三 纠“左”、反右、调整 (146)

第五章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159)

- 一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思想的总体脉络 (159)
- 二 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萌芽 (194)
- 三 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224)

第六章 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 (259)

- 一 中苏关系破裂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影响 (259)
- 二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思想状况 (280)
- 三 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291)

结语 (299)

后记 (307)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早期认识

一 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①但导师们的这一设想在日后的实践中并未变成现实。

19世纪50年代，受当时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马克思曾把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纵向发展的停滞性绝对化，认为东方社会横向结构上的僵化必然导致其纵向发展上的停滞。同时，他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冲击，承担着“破坏性”（瓦解原有的僵化社会结构）和“建设性”（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双重使命”。他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认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的，历史中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相对而言，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农村公社，不是苦于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1页。



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据此，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侵略，对加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未来的前景是比它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即东方社会的出路在于资本义化。当然，这只是为之获取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基础的过渡。

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晚年马克思将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在对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作人类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像俄国这样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和保留农村公社制等前提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且可以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依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设想。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谈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① 1881年3月8日，他又在《致维·伊·查苏里奇的信》中说：“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② 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明确表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69页。

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很显然，晚年马克思已经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俄国社会能否避免走西欧发展道路，直接由村社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战略出发，倾向于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揭示了东方社会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共性制约下的个性。

列宁沿着晚年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俄国实际，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新的探索，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就是这一探索的展开。早在十月革命前，针对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同时却迅速资本主义化的俄国的具体国情，列宁认为在俄国，必须通过政治上把“民主共和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中介，经济上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且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后，方能迈进社会主义的门槛。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论著中，列宁仍然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高于我们现时的经济”，因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就是迂回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①

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因为列宁认为俄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落后很多。十月革命后，为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对于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则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列宁准确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②他承认，“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③“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④

实践证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共产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4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70页。

④ 同上书，第39页。

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它过低地估计了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分开来，错以为只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可以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也印证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认识发展的心路历程：“当时认为可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曾经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①

在经历了失败与挫折之后，列宁很快在1921年春天作出了新的选择——实行“新经济政策”，其深刻的涵义就是在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力、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即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来，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沟通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系。尽管新经济政策的尝试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列宁提出的这一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对后人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观

消灭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已清楚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文件对此有明确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规定。但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时还只是一般的设想，没有实践经验与参照。应该讲，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模式，全党经历了长期、艰辛的探索。

近代以来，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搬来了各式各样的思想武器，提出了各种救亡图存方案，以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打受欺的被动局面。其中既有早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也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既有主张单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主张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也有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可见，当时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热情不可谓不高，学习的内容不可谓不多，但结果却是丝毫未能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状况。而且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还总是欺负“学生”。人们对此普遍感到困惑，中国的出路何在？恰在这个节骨眼上，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为正在寻求救国出路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的选择，既然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人们自然会转而求助于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由欧洲转向俄国，认真了解和思考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而形成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1918年7